

俄国在满洲

(1892—1906)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著

商务印书馆



俄 国 在 满 洲

(1892—1906 年)

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 的对外政策史纲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 著

陶文钊 李金秋 姚宝珠 译

(新译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 年·北京

Б. А. Романов
Россия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1892—1906)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мени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Ленинград 1928

俄国在满洲
(1892—1906 年)

(专制政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对外政策史纲)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 著
陶文钊 李金秋 姚宝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⁷/₈ 印张 1 插页 401 千字
198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59 定价: 1.60 元

译者前言

《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一书是列宁格勒叶努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社于1928年出版的。作者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1889—1957年)。该书1937年曾由民歌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作《帝俄侵略满洲史》。1952年由苏珊·威尔伯·琼斯(Susan Wilbur Jones)译成英文(«Russia in Manchuria (1892—1906)»)。本书是根据俄文原书重译的。

本书注释、索引中所用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译文边码。

原文段落过长,为便于阅读,译文参照英译本重行分了段。

原书有两则附录:(一)俄国采金公司,(二)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附录(一)列举了俄国采金公司的股东名单,各占股份数额,与本书关系不大,译文从略。附录(二)的有关部分附于书末。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张振鹏、杨诗浩等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1979年1月

目 录

原书出版说明	1
原书前言	2
导言 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1892—1917年)	7
第一章 满洲问题的由来(1892—1895年)	37
第二章 俄国对满洲的“和平”渗透(1895—1896年)	77
第三章 对中国南满领土的“侵占”(1896—1898年)	117
第四章 向长城以北对英国的“极有害”的退让 (1898—1899年)	184
第五章 对满洲全境的“临时”占领(1900—1902年)	209
第六章 战前的最后阶段(1902—1904年)	303
第七章 战争时期俄国的国际财政关系(1904—1906年)	398
第八章 战后满洲的“大型企业”	460
附录 1897年的辛迪加和蒙古矿业公司	484
索 引 1. 人名索引	489
2. 内容和地名索引	501

原书出版说明

列宁格勒叶努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出版社出版 B.A. 罗曼诺夫 III 的著作《俄国在满洲》，首先是为了对俄国帝国主义的远东政策这一现实问题提供新的、主要是真实的资料。

罗曼诺夫完全达到了从我们极为丰富的档案中吸取新鲜资料的目的，这和出版社的想法是吻合的。这样，就以沙俄东方政策这一最重大的问题为题材，撰写了有丰富的实际内容、并用文献详加阐明的专题著作。

罗曼诺夫分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把日俄战争前一时期向满洲输出俄国资本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以帝国主义世界性冲突的加剧作为广阔的背景，研究了由于满洲市场而造成的地方性冲突（不仅是日俄冲突，而且有英俄冲突和美俄冲突），从而揭示了俄国专制政体的整个中国政策、特别是满洲政策的帝国主义 IV 实质。

这一题材的确定引导作者去研究俄国帝国主义这个总题目，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研究的也是这个问题。

但是，罗曼诺夫没有揭示作为沙俄整个帝国主义政策基础的各阶级力量之间的斗争，而是附和 E. 格拉诺夫斯基同志最近在其著作中用别的资料阐述的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因而明显地高估了个别人物的作用，对于解决俄国帝国主义这个总问题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综上所述，出版社认为，罗曼诺夫的这本著作的出版不仅会引起小范围的东方学专业工作者的兴趣，而且会引起一切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的兴趣。

原 书 前 言

V 我在 1923—1926 年发表了一些论述俄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远东政策的历史论文，本书就是由我原来打算出版的这些论文的集子扩展而成的。本书《序言》和头两章写作时，我尚未放弃出论文集的想法，我将过去发表的文章作了一番修改以付新版，《序言》和头两章就是这样写成的。^① 不管这时需要作多大的修改和补充，《序言》和头两章仍未突破原先的计划，只是需要扩充论文集的篇幅。而在第三章的写作过程中，就愈来愈明显地看出，坚持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我到那时为止（1927 年初）进行的最新研究中所搜集的材料，在原先结构的框框中容纳不下，这就促使我另写详尽的学术著作。而当用作第三章的那部分写成时，则已经超过了原计划出版的篇幅。这样就得或者停止以后的工作，把写到半截的书拿去出版；或者继续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为了排印第三章，必须先把头十二印张印出并把它拆版，因此，当我正式决定继续工作时，我已经没有可能再回过头来修改第 3—128 页了，这些文字却还只是为了出《论文集》而写作的。^② 从第三章到第八章则是另写的。

现在问世的《史纲》就是这样产生的。《史纲》书名表示的主

① 《序言》是由一篇名为《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的简要述评改写成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西伯利亚之火》杂志 1926 年第 4 期上，第一、二两章是由论述《李鸿章基金》一文的第一到第五部分扩充而成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列宁格勒出版的《阶级斗争》杂志 1924 年第 1、2 期合刊，第 77—110 页。

② 对于《序言》和第一章，其中包括第一章的第二部分说来，出一本《论文集》是特别理想的。

题，是贯串全书的唯一线索。书中研究的基本课题只是帝俄在总共十五年间对外政策的一个问题。但是，专制政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进攻性政策正是针对满洲的，并且主要是针对满洲的。这一政策在日俄冲突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促使了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从而极为有利于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一政策最终使得俄国政府对于当时已显出苗头的帝国主义冲突失去了行动自由，通过战争和 1905 年的革命，它使俄国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专制政体也就在这个怀抱中于 1917 年遭到覆亡。因此，我想我对所研究的题目及年代加以限制，并没有破坏本纲要主题的完整性，也没有降低它的意义。

在我们最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关于俄国帝国主义的问题成了中心问题。在此，我希望，本纲要对这个总问题能有所阐述。考虑到这个总问题，我才把帝国主义时代专制政体的对外政策选作研究专题。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已能依据 M. H. 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在著作中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那些定论。我一步一步跟踪俄国的外交活动，并将自己的任务确定为：研究俄国外交活动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它企图实现的纲领，这样或那样影响这一纲领发展的各种动力，最后，研究在专制政体上层机关中所发生 VII 的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解体），离战争愈近，这种斗争或解体便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在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其发展的各种条件与专制政体是互相矛盾的；我是从这种矛盾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我觉得，我对当时俄国政府外交机构留下的资料进行了相当专注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愈来愈多和愈来愈确切地观察到，专制政体是如何（徒然地）企图不仅适应这些条件，而且要置身于这种发展之中并占据一定的地位，以便既能保障它在国内的统治，同时还使它不落后于别的大国，而能在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上应付自如。我在史纲中尽可能确切叙述的主要是我对帝国主义国际舞台远东

部分的满洲地区的考察结果。

我远不以为这些考察已经多少是详尽无遗的了，甚至在我所接触到的材料范围内也是如此。但是每一个利用档案资料从事现代史问题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浩繁案卷的数量和状况使研究者面临着多大的困难。本书所用的基本档案是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经手处理的文件。当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段穿过满洲进行敷设的问题刚一发生时，第三处便于 1895 年成立了，并且很快就起到了似乎是财政部外交司的作用。但此外，我也在别处的档案中找到了一系列最有价值的文件。^①但由于纯粹外部条件的原因，当时我未能如愿地更广泛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外交部的档案。

VIII 在不能同样多地利用外交和财政两部档案的情况下，我恰恰能较多使用后者的档案，这对本书也许是较为有利的。在我所研究的那些年中，几乎完全是由维持执掌的部当权的，财政大臣在俄国远东政策的方针和外交活动中起着指导作用，这是远非偶然的。因此，要研究当时专制政体的经济政策在俄国国际关系中是用哪些方法、在何种程度上确定并解决自己的任务的这个问题，不应当首先从外交部去寻找基本资料。何况外交部用(本部和别部的)文件副本的形式颇为完备地供给财政部总务司以大量的资料。而从 1900 年夏季起，在拉姆斯多尔弗任外交大臣期间，外交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变成了财政部的一个隶属机关，不事先征得财政大臣的同意，它在远东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财政大臣则支配着他在远东的精明强干和机警灵敏的代理人员，并支配着中东铁路公司和华俄道胜银行的一整套机构。

满洲有一段历史与维特的名字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我能深

① 本书在以下进行援引时，注解中凡未提档案，只注明案卷号数者（“第几号卷”），即表示案卷属于财政部总务司第三处的档案。在指明档案而无出处者，即表示档案取自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凡取自莫斯科的档案必加以说明。

人研究他的远东政策的内在活动，这就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我能进一步确定并论证我在研究中应加以评述的方面。我认为这一方面具有极重要意义是出于下述考虑的。维特是从私人资本主义阵营那边过来的人，这一情况再加上他的经验和天赋条件，造成了他在亚历山大三世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从而使他比别人更适宜于承担使专制政体的政策适应于新环境的使命。维特作为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铁路股份公司的巨头，之后又作为全俄范围内统一的铁路运价经济政策的头一个主宰，他在就任大臣的同时，就担负起了详细制订并实现将整个西伯利亚纳入俄国资本主义的版图这一庞大计划的任务。这一计划的国际政治意义从最初步骤起就把维特引上积极干预国家对外政策的道路，愈到后来愈是这样。而维特“把一切抓在自己手中”的强烈愿望也不单是（如他的同时代人会感觉到的那样）他个人天性的表现，而是由使俄国的内外政策互相符合的客观需要所造成的，对内是力图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保障专制政体的领导地位的政策，对外则是在外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为本国取得市场的政策。处于帝国主义九十年代的高涨和在国际范围内前进运动的条件之下，维特的这种干涉能实现的程度，决定了俄国在远东的进攻性政策和金融资本结成紧密联盟的程度。在此所依靠的是圣彼得堡国际银行，并把华俄道胜银行和与其密切相关的中东铁路公司提到了首位，然后是那些私营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答应，在满洲土地上不脱离俄国财政部的控制。国家资金在这一银行—铁路—轮船—矿山联合企业中事实上拥有的股份愈多，在1900年及以后各年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对满洲财富的经营愈是没有前途，这一政策的垄断特性就暴露得愈显著。正是由于这种垄断特性，它对满洲愈来愈具有好战性，直到最后才以战争而告结束。

维特身为财政大臣，作为由他奠基和领导的“托拉斯”的政治

指导者，他是这一政策的鼓吹者。然而，他在生前用尽了千方百计，死后又用他自己的《回忆录》，以利于制造并最广泛地散布一种神话，似乎他的政策纯粹是“和平”性质的。尽管这一神话极为拙劣，但它至今仍颇有市场，因此要粉碎这种神话，就要对这一政策的每一步骤和各种变化用种种方法加以详尽的专题研究。我正是把这种研究作为自己的任务的，并在财政部外交司来往公文的原件中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最确切的细节材料。我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这样的细节，并力图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极鲜明地揭露那种政策的真正性质和实际意义。这种政策是帝国主义时代通过专制政体忠仆之口为专制政体谋划的。

在本书问世的时候，我要感谢把本书纳入出版计划的列宁格勒叶奴基杰东方学研究所委员会。多亏了莫斯科中央档案馆和列宁格勒中央历史档案馆主管人员对我始终不渝的优待，我才能着手利用作为本书基础的档案资料，并把本书撰写完毕。至于本书的最后完稿，我觉得在此要特别感谢 A.E. 普列斯尼亚科夫，他欣然承担了校读本书手稿的工作。

本书还附有一张满洲地图，图中标出了书里提到的俄国和他国已成立和拟议中的工业、林业和铁路租让企业。T.Φ. 科佩洛娃绘制了这张地图，从而给了我不可缺少的帮助。

作 者

1928年9月30日

导 言

俄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

(1892—1917 年)

在俄罗斯帝国的国际关系史中,满洲问题在 1895 年已完全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出现,并且占据了首要的和最急切的地位。它在此后整整十年中,成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满洲问题的这种地位是直接并仅仅与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的动工兴建有关的。这条铁路对于俄国在日本海沿岸进攻性政策的贯彻速度和规模的改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论这条铁路的修筑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符合了什么样的需要和利益,它总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把辽阔的西伯利亚大地和中部俄罗斯连接起来,这是老早就有的愿望。经过一系列局部工程的动工和拖延以后,这一愿望终于在 1892 年不仅被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要立即付诸实施。从此以后,俄国的对外政策随之不断产生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的事件,这些事件的更替和连续是异常迅速的,不可遏止的。当时从技术方面,主要是从财政方面,对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计划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是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全长七千多俄里、打破世界纪录的宽轨大铁路。具有这种形式的这项计划不仅考虑到国内铁路交通干线的简单扩展,也不单从商业角度考虑把分散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各贸易点有利地断断续续地联系起来,而且似乎具有世界意义。俄国在这条铁路的末

① 即海参崴。——译者

端，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的范围，它希望，由这条铁路所造成的“欧洲和东亚之间交通方向的变化应当对它〔俄国〕有利”。西伯利亚铁路被正式宣布为一项“世界性事件”，“这类事件开创了各民族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常常引起各国之间既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革”。这条铁路还被看作是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工具，它将使俄国能“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①

还有一个问题。在 1891 年，残酷的饥荒以无与伦比的力量蔓延于俄国的欧洲部分，当时的财政大臣维特在他的奏折中吹得天花乱坠的计划，看来是在大饥荒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而实现这一计划的重负在最近若干年中首先正是落到了俄国农民的身上；这条铁路就是由于饥饿和无地，为他们逃难到还是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所敷设的捷径。指望对已经形成的国际经济力量的结合产生革命作用的这项计划，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国内阶级关系的发展中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铁路就象一条传动带，它如今以最敏感的方式把国家和远东的世界帝国主义机构连接在一起。在这一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外部事实是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规模之大，意义之深，对于一个仅有西伯利亚水路和驿路的俄国说来会是不可想象的事。维特在 1892 年所宣称的“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的口号本身包含有一种纲领，这个纲领促使俄国政府把西伯利亚铁路一段长达二千多俄里的路线穿过满洲全境，从而极大地加速了俄日帝国主义冲突的成熟和战争的爆发。

俄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并没有使俄国离开满洲。它只是缩小了俄国在那里的势力范围，这是对日本有利的；而横穿北满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干线这一传播俄国影响的导线，却仍然留在俄国人的手中。诚然，尼古拉政府直到战争爆发前一直在顽固推行的垄断满洲的纲领，现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寿终正寝

^① 引自财政大臣 1892 年 11 月 6 日的奏折。见本书第一章，边码第 56—60 页。

了,在俄国战后和革命^①以后所处的新的国际局势下,满洲问题也已经失去了本身的尖锐性和直接的军事性质。但是,俄国在北满拥有广阔的铁路租界,即划归铁路使用的地带和一系列正在建立的居民点,以及根据 1896 年的租让合同俄国对这些居民点享有的行政管理权,因此,不论俄国在战后已变得多么虚弱,它对中国仍然是一种威胁,或迟或早,它总要将北满直接夺去的。而在 1907—1916 年间继之而来的俄日之间的那些协定,又把这两个不久前的仇敌纳入了一个确实图谋瓜分中国的军事同盟之中。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才使中国完全摆脱了各种或公开的或隐蔽的侵占威胁,这些威胁在过去一个时期是和俄国“和平征服”东亚市场的纲领相联系的,而维特的政策使这一纲领对于整个满洲三省特别富于好战性。

I

6

虽然中国与俄国和欧洲早已有了贸易关系(分别从十七世纪和十六世纪开始),但对当代意义上的外国资本说来,中国本部的“开放”是 1842—1844 年间的事。当时,“由于鸦片”引起的第一次中英战争(1839—1842 年)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与欧洲通商,规定了值百抽五的统一关税率,并且承认了英国人(然后在 1844 年承认了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治外法权。截止 1844 年,欧洲和中国的贸易额(按整数算)是:输入中国额约为二千八百万美元,由中国输出额约为三千三百万美元。其中各国贸易额的百分比是:输入额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八,俄国占百分之十九,美国占百分之七,别的国家(荷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典和德国)占百分之六;输出额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俄国占百分之十六,

^① 指 1905 年的革命。——译者

美国占百分之二十,别的国家占百分之四。^①当时俄国的贸易额集中在恰克图,货物主要是沿俄中边界由陆路运送的,加之在随后的十年中又出现了明显的每况愈下的趋势,^②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情况,那就可以说,“中国本部”(中国本部即长城以内的中国十八个省)当时几乎完全是英国资本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暂时还只是一个弱小的伙伴。

因此,后来从经济上和领土、政治上瓜分整个中华帝国的全部历史应当标志着英国实际垄断地位的相对削弱。在 1858—1960 年 7 的第二次战争以后,从 1860 年起,管理中国海关的首领,即海关的总税务司是由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担任的,这是英国人实际垄断的有重要意义的标志;而在 1898 年,条约又正式认可了这种地位,只要英国对华贸易额分别超过各国。正是英国开始采用了用战争逼攻中国的办法,从而导致十九世纪下半叶别的大国对远离帝国中心的边陲地区纷纷进行侵吞:俄国 1858 年对阿穆尔^③地区、1860 年对滨海地区和 1881 年对伊犁西部地区,法国 1862 年对交趾支那和 1874 年对安南,日本 1879—1881 年对琉球群岛,英国本身 1886 年对缅甸和 1890 年对锡金。这些侵吞暂时还没有引起侵吞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然而各侵吞国以后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的出发地点却已勾画出来了。^④

到了九十年代,朝鲜便明显成了中国领土上帝国主义国家间

① 见《俄中贸易统计资料》,海关税征收司统计科丛刊,圣彼得堡 1909 年版,第 8,21 页。

② 同上,第 11,15 页,从 1851 年到 1890 年每五年的输入中国额为(单位千卢布):九千二百七十二;八千三百六十六;五千五百八十五;四千六百三十五;三千九百八十四;二千四百八十七;二千一百二十六;二千一百八十六。

③ 即黑龙江。——译者

④ 俄国在占据了滨海地区以后,就在 1867 年以一千四百三十二万卢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在 1875 年把千岛群岛让给了日本,换取了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译者)的南半部(日本却认为千岛群岛历来是属于它的)。

矛盾触发的地点。这个王国很久以来就处于中国附属国的地位，但是中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可能发生的纠葛和冲突，允许日本在1876年与朝鲜象与一个独立国家一样直接缔结条约。之后，中国确实规避涉及朝鲜的任何交涉，不仅如此，它甚至撙节朝鲜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类似的条约，以此作为使1879年深入汉城王宫的日本政治势力失去作用的手段。

美国人从七十年代初便开始对向朝鲜渗透感到兴趣，他们首先利用了中国的上述立场，1882年的美韩条约引起了别的欧洲国家一系列类似的外交行动（英国和德国在1883年11月，意大利和俄国在1884年6月，法国在1886年6月）。1883年，中国聘请在8德国驻华领事馆任职的官员穆麟德担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和经济问题顾问，于是，这种用错综交叉的办法对朝鲜实行国际保险的政策遂宣告完成，而穆麟德则立即着手使自己新的“祖国”的外交政策急剧地转变为联俄。

穆麟德为了提防日本对汉城又一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如1882年事件），准备聘请俄国人担任朝鲜军队的教官，并向俄国提供不冻港永兴湾。但是，他的这一计划引起了英国方面威胁性的反对。英国人并占据了正位于朝鲜海峡咽喉的巨文岛。当时俄国还无力进行一次海上冲突，它又怕在远东水域再出现一个达达尼尔事件（如1885年），穆麟德的计划这才宣告破产。而1884年，中日两国军队在汉城又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这就迫使中国在1885年和日本订立临时的（在更为有利的时候到来之前）条约，双方商定不事先通知对方不得派兵去朝鲜。在此后若干年中，中国依仗着英国的支持（英国通过罗伯特·赫德坚持推行一种要将朝鲜海关隶属于中国海关系统之下的政策），根本不想放弃它对朝鲜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以在朝鲜的对外贸易额中占据首位为基础，准备将中国人赶出朝鲜，并正式宣布朝鲜

独立。至于美国和俄国,前者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后者完全意识到自己在远东的“历史使命”,正在为将自己滨海的边远地区与中央连接起来(起初即使是采用铁路和水路联运的办法)而采取积极行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要说 1885 年日中之间的条约即便 9 会在最小程度上解决如此复杂的朝鲜问题,那是连想也不用想的。^①

1891 年 2 月 23 日,俄国政府作出了修筑从莫斯科一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的决定,并在 1891 年 3 月 17 日以特别上谕的方式予以宣布。这一决定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是,它有使远东力量对比发生急剧改变的直接危险。原来俄国在远东迫于条件只不过一万名士兵,而且远离供应中心,这项决定不仅能使这些地方部队参加远东的角逐,而且能把整个帝国军队中的任何一支力量引入这场竞争,同时还能利用当地愚昧无知的百姓。在整个十九世纪中,俄罗斯帝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连绵不断的大陆上蠢笨地爬行,1878 年,它最后一次在近东遇到阻拦,1885 年,它又在中东受阻。如今在远东,正如 1892 年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俄国已经找到了以创纪录的速度不可遏止地飞奔向前的办法:西伯利亚铁路的平均建筑速度每年为五百八十七俄里,超越了一切先例,到 1895 年就已修成一千二百五十四俄里。^② 这项工程所需的款项是由巴黎交易所贷给的,丝毫没有依赖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而英

① 参见 H. B.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伦敦 1918 年版,第 3 卷,第 6—19 页。参见 1886—1894 年期间(各国)和朝鲜的贸易额变动的情况:中国从四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七美元上升到二百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三美元,日本从二百五十万八千八百三十美元上升到五百六十九万七千六百三十三美元。在这些年中俄国的贸易额从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三美元增长(↑)到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二美元(见《朝鲜概况》,财政部办公厅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0 年版,第 3 部分,附录,第 176—179 页)。

② 参见 Э. Л. 格里姆:《1895—1914 年的中国问题》(《新东方》杂志,第 6 期,第 50 页)。